

· 学术探讨 ·

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思考与探索

穆婧¹, 李鸿涛², 衣标美³, 黄璐琦^{1*}

(1.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资源中心, 北京 10070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700; 3.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100700)

[摘要] 中医药古籍整理是传承中医药学术文脉与思想的重要载体,是赓续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基于此,笔者提出了中医药古籍整理的时代目的,在于发掘传统文化的宝藏,揭示其意义,发扬其精神,吸取其经验教训,使之服务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阐述了古籍整理中的几大问题,即重视“执拗的低音”现象、避免“后出转劣”趋势、注意“代古人立言”隐患;论述了以“道统”的思想理念、不忘初心的守则、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揭示学术的本来面目和真价值的方法论;并以本草考古为例,分享了如何以科技手段破解历史密码的实践探索,以期为中医药古籍的整理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中医药; 古籍; 整理; 文献; 考证

[中图分类号] R2;R932;R28;G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21)24-0204-06

[doi] 10.13422/j.cnki.syfjx.20212050

[网络出版地址]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1.3495.R.20211026.1032.001.html>

[网络出版日期] 2021-10-26 16:51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of Literature Research on Ancient Boo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U Jing¹, LI Hong-tao², YI Biao-mei³, HUANG Lu-qi^{1*}

(1.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3.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Literature research on ancient boo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inheriting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thoughts of TCM, and a key step for continuing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urpose of sorting out TCM ancient books: to explore the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reveal its significance, carry forward its spirit, learn from its experiences, so as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CM. And this paper expounds several major problems i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that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of "stubborn bass", avoiding the trend of "latecomers turning inferior",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hidden trouble of "making comments on behalf of the ancients".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ology of carrying out accurate research and revealing the true nature and true value of scholarship with the idea of confucian orthodoxy, the rules of not forgetting the original intention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Taking the

[收稿日期] 20210926(005)

[基金项目] 外交部亚专资国际合作专项(2017131)

[第一作者] 穆婧, 硕士, 助理研究员, 从事中药学研究, E-mail: nrc_cmm@126.com

[通信作者] * 黄璐琦, 博士, 研究员, 从事中药学研究, E-mail: huangluqi01@126.com

materia medica archaeology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shared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how to crack the historical code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so a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CM ancient book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literature; textual research

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古籍是传承中医学学术文脉与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创新发展中医学的重要源泉。其承载着先贤的思想和智慧,蕴含着厚重的文化与科技内涵,以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记录、总结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斗争的经验和成果,蕴含着对人体、生命科学长期探索的认知;此外,还具有史学价值和实用意义。对古典医籍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厘清中医学学术源流,把握中医学学术发展文脉,进而促进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工作。

中医古籍产生于秦汉之际,发展于宋金元三代,鼎盛于明清时期^[1]。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度重视中医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把古籍整理作为重要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实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既包含对经典医籍和历代名著的校注和辑校,也同时将历代名医名著集结汇编,整理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影印、点校、注译、提要、语译、白话解等。

本文在对中医药古籍整理进行历史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今中医药古籍整理的目的与意义,拟就现存问题进行分析与阐述,论述中医药古籍整理的原则与方法,探索如何使中医药古籍整理更加具有条理性、系统性和深入性,见图1。

1 中医药古籍整理的历史回顾

古籍整理是保持中华历史与文明经久不衰的优良传统。由国家组织规划的影响较大的中医药文献整理主要有3个时期。最早可以上溯至西汉时期^[2]。医家李柱国职司医籍,整理方式主要分为备众本、校异同、订讹脱、条篇目、撮旨意、撰叙录等,涉医文献分为四类——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第2个时期是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宋仁宗诏令编修院置“校正医书局”,命直集贤院、崇文院检讨掌禹锡等4人并为校正医官,负责校订和刻印医药书籍。整理方式主要为编修与校正。所校医书有《黄帝内经·素问》《针灸甲乙经》《脉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方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校正医书局的建立是我国医政史上一个创举,对医学书籍的规范和医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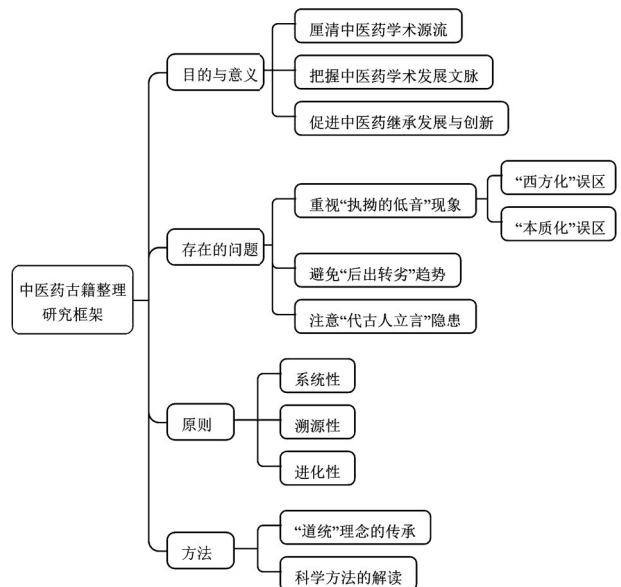


图1 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for collation of ancient boo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很大贡献。第3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80年代。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2年,卫生部制定了《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3—1984年,卫生部启动并重点推进了11种重点经典医籍的整理工作,同时规划了第2批200种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任务;1992年以后,中医古籍整理出版重点书目被纳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其后十余年来,相关古籍整理成果编纂出版《中医古籍整理丛书》,既包含经典医籍和历代名著校注和辑校。如《黄帝内经素问校注》《神农本草经辑校》;也同时将历代名医名著集结汇编,如《东垣医集》《丹溪医集》等。整理方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影印、点校、注译、提要、语译、白话解等。蓬勃发展的古籍整理事业造就培养出一大批当代中医古籍文献大家,有效改善了中医药古籍文献整理与传承“后继乏人”的紧迫局面。

2 中医药古籍整理的时代意义与目的

古籍整理无论古今,均是从时代和社会需求出发,注重其学术传承“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孔子编“六艺”为宣扬儒家思想;宋朝理学家注经为印证与宣传道学理论;清朝修《四库全书》为实现文化专制,统一思想。而当今时代整理古籍则是为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3]。所以“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能够发掘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宝藏,揭示其意义、发扬其精神、吸取其经验教训,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文献支撑与保障,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础性工程。

3 古籍整理存在的问题

清代史学家和思想家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指出,要通过古籍整理,弄清楚学术源流,明晰学问传承关系,从而反映学术兴衰过程,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4],要明道而达理,洞见本源。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整理国故”运动,倡导对古典资源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意在创新^[5]。而在当今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古籍整理如何正确做到“溯其源”“取其精”“新其用”,是当今古籍整理工作者需要重视的问题。

3.1 重视“执拗的低音”现象 日本丸山真男提出了“执拗的低音”这一概念,即晚近以来西方对日本的冲击、影响,传统思想进入“低音域”,进而为人所忽略;丸山氏认为:“在近代日本,欧美近代思想虽然居于压倒性‘主旋律’的位置,但它也常常被低音的某些音律,也就是日本自身的文化思想所修饰,这种‘执拗低音’有时成为背景存在,有时被主旋律掩盖,但是它始终存在,有时甚至压倒主旋律。”^[6]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相对百年以来受西方工业文明影响形成的现代学科体系所发出的“高音”而言,世界各国的传统文明逐渐弱化成“低音”。在这种高低音交织在一起的情境下,“高音”会一度掩盖甚至淹没“低音”,占据科技发展的主流。由于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传统学科和传统学术受到质疑,甚至是削足适履式的改造。同时,因受制于进化思维,误把现状认作事物的本质。

3.1.1 “西方化”误区 自晚近以来,西方思潮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使我们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构架、方法解释古代理论。经常会用1个规律的思维解释事物的发展,使“发展”变得非常有规律。而不能包括在规律性格局之内,或不形成一个有规律样子的发展,往往被搁置在一旁,逐渐边缘化^[7-8]。有学者指出:“近代中国史学过度受到西方的影响,每每把古代现代化、把中国史欧洲化,用十九世纪以

来所形成的很多学术概念或范畴回去套在古代,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8]

在现今这个大数据时代,很多事物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是存在一种联系。所以说正是用了这样一种“规律套用”的研究模式,使得原本非常重要的文化与学问,在现代新的“西方化的”格局和架构下变得格格不入,因而成为“低音”,即所谓的“西方化”误区。《华佗隐藏的手术——外科的中国医学史》中提到,其实中医原来也有外科,可是近代西方医学认为中医只有内科,在这种气氛之下,不管是在实践或是表述上,愈来愈强调中医内科化的过程,反倒遗忘了其原来外科的部分^[8]。于是把从千年以前本就掌握的拔脓去腐、生肌敛疮等宝贵的实践经验丢弃,这是“西方化”误区造成的典型谬误。

3.1.2 “本质化”误区 在新思维框架下,往往认为只有最当前的、最科学的、最进化的才是最正确而有价值的。近代世界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进化思维,认为这个时代应该就是到目前为止相对而言最高的阶段,所以很容易将现状“本质化”,隐然认为现状便是该事物的本质性内容,忽略了其可能只是近几十年或几百年来形成的,并不是“本质”^[8]。

近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有些人盲目否定了先贤总结出来的规律和思想,错误地认为只有现代的“理论”才能认识世界,才是事物的“本质”。笔者认为,不能否认现代科技的强大,但也需要认真对待古人的智慧。现代科技与古代思想,应该相互融入,才能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最终为人类进步起到各自的作用。而注重挖掘古籍中的“智慧”,使之服务于当代科技发展,是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者需要注意的。屠呦呦研究员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得到启发,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最终发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永炎院士利用中医的五运六气学说推断出疫情的爆发。在疫情初期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紧迫形势下,黄璐琦院士从经典医籍、经典名方中寻找依据,研发我国首个完全具有知识产权的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药新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由此可见,传统文明的“低音”始终执拗的发出自身特有的音频,甚至是在机缘成熟之际,大放异彩。这些生动实例,都体现出在古籍整理过程中需要对“执拗的低音”给予充分的重视,甚至做到有意识地通过自身的感悟

来进一步“自觉觉他”。

3.2 避免“后出转劣”趋势 古籍整理是一个学术积累的过程,后出的学术成果应该体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征,后出更优^[9]。如若后出的学术成果没有进行深入研究考辨、认真借鉴或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则会出现收录不当、重复整理、辑佚未当等问题,重则导致学术倒退。如何避免这种“后出转劣”的趋势,是当今学者需要正视的问题。古籍整理并非简单的校勘、标点与注释,还包括对古书,乃至著者学术、生平、社会环境等进行相关研究,这才能体现古籍整理的价值所在。中医学的自身特点使其更加依赖于古籍文献,中医古籍文献整理与其学术研究之间所呈现的关系更加紧密,对古籍学理性的考证、辨析和论证更为重要,直接影响到学科和学术范式的规范和演进^[10]。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着眼于其学术价值的焕发,一方面将古典学术思想纳入现代知识系统和学科框架内予以重新考量,为现代学术提供古典资源;另一方面在对古典学问和思想进行整理、归纳和系统化的过程中确立新学科,丰富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11]。例如,郑金生^[12]对《本草纲目》的整理、张瑞贤等^[13]对《植物名实图考校释》的校注均包含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值得借鉴。

3.3 注意“代古人立言”隐患 古汉语知识是古籍整理中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语言的语音、语义、语法都会发生变化,扫除古籍中的语言障碍是整理古籍最基本的任务。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往往会把主要精力用在古书中那些难懂的字词句方面,这无疑是必须的;而对于那些从字面看是大家所熟悉的、似是而非的词语,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去正确处理,轻者会导致理解不准确,重者会导致误解^[14]。如清代高士奇《扈从西巡日记》:“望海寺在半冈万松之表。”其中的“半冈”做“万松”的定语,语义上指万松的位置,如果把“半”按本义理解为一半,这句话的意思就要理解为“望海寺座落在有万松生长的半山冈上”。现代汉语有“半山腰”的说法,故而上面的表述不会引起人的注意,但事实上,望海寺是元代重建在东台顶上的。显然“半”在这里不能按其字面意义去理解。“半”有假借为“判”的用法,是“片”的意思。高士奇原文的意思应是望海寺耸立在由茂密的松林覆盖着的一片山冈之上。站在东台顶上,俯瞰周围众山峦,有茫茫一片的感觉,自在情理之中^[14]。又如,《伤寒论》中所使用的“煎”“熬”二字,若按现今直解,则与

原意大相径庭。所以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这种境界不仅仅在思想,也在当时的语境、语法等方面;不是靠退缩回过去,而是要运用一切学术资源,真正做到“重访”,真正把握“低音”。

4 古籍整理的原则与方法

4.1 孔子编修“六艺”的启发 “六艺”是孔子为教授其徒而先后设置的六门课艺,分别取材于6种历史文献资料,即礼、乐、射、御、书、数,并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和编订的成果^[15]。面对“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的局面,孔子利用有限的资料,整理了夏商周3代的文化,“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于是合为六经,亦谓之六艺”。有学者谓之:“不仅是囊括了人类一切学术的完备知识体系和经典体系,而且是能够彰显中国传统所固有的根本文化精神、弘扬人类普遍的超越性价值的一贯之道,因而也可称之为六经之学、六艺之道”^[16]。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宋人治经,是做意义上的探求;清人治经,是做方法上的探求。”^[15]而孔子在编订“六艺”的过程中既重视意义的开发,又注意方法的讲求。意义的开发表现为对“六艺”原义的揭示,并结合时代要求提出创建和新解;方法的讲求则体现在“下学而上达”和“一以贯之”这2个重要方法的使用上。“下学而上达”,即能从文献资料中的具体事项抽绎出普遍的原则。“一以贯之”,即能够把学习文献资料的心得体会贯串起来,予以系统化。其方法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目的是服务于文献价值的理性探求。孔子编订“六艺”的优秀经验,对古籍整理的现代化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15]。当今的古籍整理工作,要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原则,可以概括为系统性、溯源性和进化性。其一“传承精华”,首先要用“道统”思想,把古代思想“一以贯之”,予以条理化、系统化;其二,要寻找每一种学术思想的发生与发展,要不忘初心,即溯源性;最后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做到“下学而上达”,即进化性,以揭示学术的本来面目和真价值。

4.2 “道统”理念的传承 “道统”概念,始于唐代韩愈,而光大于南宋朱熹。朱熹将“道统”概念哲学化,完成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道统学说的确立^[17]。南宋朱熹最早提出了哲学化的“道统”概念,以“危微精一”阐释其理想内涵,作为“道统”的心脉,来阐释其理论内涵,

将两宋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学人物纳入“道统”谱系,形成了传承脉络清晰、思想主题明确,具有强烈正统意识与自觉弘道精神,同时也能够融入民众世俗化的“道统”观念。程朱理学的“道统论”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体系,有着作为经典依据的儒学典籍,独立的历史传承谱系,以及作为理论核心的哲学问题。

葛兆光^[18]指出:“重新确立一种知识与思想的权威,如果没有历史渊源的支持,没有经典文本的证明,特别是如果没有来自儒家经典的证明,诠释的合理性将会受到无边的怀疑;但仅仅拥有古老经典的依据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思想历史的谱系”。提出“道统”这一名称的实质意图,是对“道”的重新把握,反映了重振学术传统的自觉意识,即现在提出的“文化自觉”。树立“道统”思想理念,蕴意有四。一是“道”为《黄帝内经》的最高范畴,领悟“道”即把握了学术精髓,方知“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的至高境界。二是中国人治学讲求“学以明道”,明道的过程就是达到“圣人”境界的过程,个人的修养学识要与先贤的优秀成果融洽贯通,以达“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至真素养。三是历史上儒学“道统”概念的提出,原本就是为了在儒学自身张力范围之内不断地创新,同样中医药学术在历史各个时期也在不断“当代化”,践行“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的至善追求。四是儒学讲究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和政治追求,而中医学也表达了“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宏大愿景,二者主张“道统”的意图十分贴近,彰显“经世致用”的至诚初衷。所以说,中医“道统”是一个系统性的学术传承谱系,即以中医经典为根本,基于历代医家对经典诠释的积累,运用中医术语,进而体现原创思维与临床创新的知识传承体系。遵循“道统”,就是遵循中医学术价值的规律,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仁者爱人”“齐同慈爱”的价值目标。

4.3 古为今用、科学解读:以科技手段破解历史密码 钱学森先生指出:“中医理论是系统观的,这是科学的。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19]这里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思维、一种认识。所以说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也是21世纪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科学就要用科学的方法,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整体观。马克斯·普朗克曾说过:“科学是内在的整体,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

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20]提示古籍整理时要用科学的方法,更要有整体的意识。

2016年,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西汉海昏侯墓园主墓中出土了由木质漆盒盛装的样品。黄璐琦院士研究团队通过核磁共振、三维重建及显微分析,发现该样品是由外部辅料层和内部植物层构成。结合显微特征、质谱分析,推测该样品中为玄参科地黄属 *Rehmannia* 植物的根,且可能经过了热水等处理。《神农本草经》记载地黄具有“主折跌绝筋,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等功效,这与古代文史资料记载墓主生前患有严重的风湿病相符。样品的辅料层内含有淀粉粒与蔗糖,这可能与炮制矫味矫臭、利于服用的作用有关。木质漆盒内遗存样品是迄今报导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中药辅料炮制品,其发现和鉴定为深入了解我国古代药物炮制与应用历史奠定了基础^[21]。这是用科学整体观解读历史密码的典型案列。同时,要注重运用数字科学与人工智能大胆探索。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面推广,将古籍数字化、智能化已成为古代典籍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并取得了较大发展,对于古籍整理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古籍标点符号的标注、古籍语法勘误、添加笺注、古籍数据库建设等。此外,在此过程中还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及知识产权的保护。

5 结语

中医药古籍整理要有坚定的理念——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去挖掘中医药学中真正符合人体生命运动规律及疾病发展规律的精华部分,实现与西医学的交叉互补,进一步提升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丰富诊疗手段,从而推动生命科学领域新一轮的革命。通过实践后发现,对于中医药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来说,古籍是其本底。本底若得不到系统梳理与研究,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逐渐失去其优势与特色。梳理挖掘中医药古籍,切实做到“古为今用”“为往圣继绝学”,是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举措,对于厘定中医药学术源流,发掘中华文明中的生命科学智慧,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益冲突】 本文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张陶. 浅谈中医古籍的发展、整理和利用[J].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11(6):124-126.
- [2] 余瀛鳌. 中医古籍整理与文献研究的今昔观[J]. 中医药文化, 2008(3):8-10.
- [3] 路开源. 探讨古籍智能整理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20):100-101.
- [4] 雷家宏. 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J]. 华中国学, 2018(1):207-210.
- [5] 雷颐. “整理国故”:为科学在中国寻根[J]. 同舟共进, 2019(5):68-70.
- [6] 葛兆光. 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3):53-63, 206.
- [7] 王毓铨. 王毓铨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308-317.
- [8] 王汎森.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2-14.
- [9] 吴庆晏. 后出转劣:古籍整理中值得注意的现象[J]. 中医文献杂志, 2018, 36(6):44-49.
- [10] 谷建军, 李成文. 从整理国故论当代中医古籍整理方法的深化[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41(6):459-463.
- [11] 殷学国, 蒋述卓. 古籍整理与现代学术演进关系分析[J]. 学术研究, 2016(9):161-167, 178.
- [12] 郑金生. 《本草纲目》金陵版重修本——制锦堂本初考[J]. 中华医史杂志, 2014, 44(2):106-110.
- [13] 吴其濬. 植物名实图考校释[M]. 张瑞贤, 王家葵, 张卫, 校注.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8.
- [14] 李凤英. 古籍整理中不可代古人立言[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6):76-79.
- [15] 李耀仙, 肖永贵. 从孔子编订“六艺”说到古籍整理现代化[J]. 儒藏论坛, 2019(1):162-183.
- [16] 朱晓鹏. 论马一浮对六艺论儒学经典体系的重建[J]. 浙江社会科学, 2021(3):112-119, 130, 160.
- [17] 徐公喜, 邹毅. 朱熹道统谱系论[J]. 江西社会科学, 2004(8):118-121.
- [18]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2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142.
- [19] 巩献田. 浅谈钱学森的中医观——钱老关于中医部分论述之刍议[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S1):49-76.
- [20] 钟月明. 当代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J]. 桂海论丛, 1994(3):63-66.
- [21] 彭华胜, 徐长青, 袁媛, 等. 最早的中药辅料炮制品: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木质漆盒内样品鉴定与分析[J]. 科学通报, 2019, 64(9):935-947.

[责任编辑 刘德文]